

精明与荒芜的二重奏

——论短篇小说《选择》中的人物性格、语言修辞和时代隐喻特色
何开文

何開文，筆名可人學人，江蘇寶應人。系中國新聞傳媒集團顧問、中國微型小說學會理事（第三屆）、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

1984 年以來，已在《文藝報》《文學報》《雨花》《天津文學》《微型小說月報》《金山》《微型小說選刊》等中外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評論、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 400 多萬字。已出版微型小說集、散文集、評論集、詩歌集及學術論文集等作品集 19 部，主編出版文學、論文、寫作等專集 15 部。

曾獲國家、省、市、縣級各類徵文（一、二、三等和優秀獎）60 多次，有獲獎作品集《收穫夢想》佐證。

她一生都在用“详细的、认真的、谨慎的”计算去规避贫穷，却在时代的洪流中输掉了灵魂。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不仅是一部女性心灵史，更是一份关于香港社会转型的精准底层报告。

——评论者推荐语

绪 论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平日写作之余，冲泡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打开好友的心扉，聆听一则励志的故事，便是人生最顺心意的时刻。而这一意境，是我在阅读了香港著名作家陈赞一博士（以下简称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后感觉到的。

短篇小说《选择》（收入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出版的小说集《路途上》，全篇共计 5285 字），如一粒投入当代文学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超越了短篇小说的文本边界，触及了人物形象、语言修辞、时代隐喻的多重维度和特色。读完全文，我不得不佩服陈博士构思的巧妙，在此也看出陈博士的短篇小说创作笔力非同一般。

《选择》以女主人公倩媚跨越数十年的迁徙与婚恋为主线，勾勒

出一幅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图景，揭示了一位女性在时代巨变与地域流转中的命运轨迹。通过重复修辞、书信体与隐喻形式，揭示了个体在有限选项中“自由选择”的虚妄性，而其“荒芜”则是资本逻辑与父权结构合谋下的必然结局，终指向一个时代的心理伤痕。倩媚的一生，是对“选择权”这一现代命题最深刻的解构与反思。

陈博士的笔触冷峻而又克制，小说标题虽为“选择”，但通读全篇，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在历史夹缝中被迫做出的、充满无奈与阵痛的挣扎。

本文拟从“人物形象”“语言修辞”与“时代隐喻”三个方面切入，论述陈博士创作短篇小说《选择》的文学特色。

第1章

人物形象特色：精明与荒芜，创伤人格的双重面相

所谓人物形象，是一个在文学、影视等艺术创作中非常核心的概念。它指的是作品中的人物通过外貌、言谈、行为举止等具体元素，向他人展示的性格、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并在受众脑海中构建出的总体印象。

在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中，主人公倩媚从内地乡村到香港、从香港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美国，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地理与情感的双重断裂。然而，作者并未将她简单刻画为一个负心者或拜金者，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人物性格的内在分裂与时代烙印。

与之相对，民进、初杰、大富、阔财、素英和母亲等人物则以各自的稳定姿态，构成了倩媚命运的对照镜像，使得倩媚成为了香港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极具社会学意义的典型——她是历史的幸存者，也是情感的流浪儿。

1、极端的务实者：撕碎浪漫的假面。务实，是指注重实际、从现实出发，追求实效而避免空谈。它由“务”（从事、追求）和“实”（实际、实效）组成。

小说《选择》中的倩媚性格最鲜明的底色是极端的务实。对于生长于贫困农村、经历父亲非正常死亡的她来说，精神层面的“爱情”和“理想”是奢侈品，甚至是陷阱。

倩媚无疑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复杂的人物。她的性格呈现为多

重矛盾：既机敏聪慧又自我欺骗，既渴望幸福又不敢承担，既深情又决绝。作者通过她一生中的四次重大“选择”——离开母亲去香港、离开民进与初杰相处、离开初杰嫁给大富、离开大富投向阔财——塑造了一个在物质与情感之间反复摇摆的女性形象。

在与男友民进的分手中，倩媚展现了惊人的理性冷酷。当民进还在纠结于两地分隔的情感撕裂时，她已经算清了账：“你所追求的，我觉得不切实际，我所追求的，你又觉得太过市侩。”她深知自己无法承受等待的代价，也无法适应大陆那种她已经陌生的生活。她的决绝，源于一种深层的生存恐惧，害怕再次回到那种连花生油都吃不起的日子里。

2、精明的计算者：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精明，通常是指心思细致、眼光敏锐，善于权衡利弊，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它由“精”（精细、深入）和“明”（明晰、洞察）组成。随着剧情推进，倩媚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商人的算计能力。这种能力让她在香港的社会底层中游刃有余，却也让她失去了真心。

在面临初杰与大富选择时，陈博士精准地描绘了倩媚心理天平的倾斜。初杰代表“作育英才”的理想，但在她眼中，那是“没有出人头地日子”的代名词；大富代表“几层楼收租”的安稳，虽然乏味，却能保障她不再受穷。她引用“良禽择木而栖”，将婚姻视为一场资产重组。

最能体现精明之处，在于倩媚对选择权的操纵。无论是面对母亲的询问，还是面对素英的挽留，她总能抛出“经过详细、认真、谨慎的考虑”这一套说辞，将自己对利益的追逐包装成无奈的生存选择，从而在道德上获得某种“豁免”。

然而，倩媚并非一个冷酷的算计者。陈博士赋予了她丰富的内心层次：她写分手信时会说“我曾经深爱着你，并且现在依旧喜欢你”；她在补习社的岁月中也有过理想与友情的温暖；她在被阔财抛弃后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冷静地反思“我们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们选择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些矛盾的言行，揭示了一个悲剧性的真相：倩媚并非不想爱，而是不敢爱；并非不渴望稳定，而是从未学会信任任何形式的稳定。

3、防御的刺猬者：幽默背后的心理铠甲。防御，是指为抵御、防范可能出现的伤害、威胁或攻击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或行动。它的核心在于“防患于未然”或“减少损害”。

小说《选择》开篇关于“荔枝”和“柿子”的对话，是倩媚性格最生动的注脚。她伶牙俐齿，用俏皮话截断母亲的唠叨，用“新年代”反驳旧观念。这种语言上的攻击性，实际上是她保护自己的铠甲。

她越是表现得顽皮、不在乎，内心其实越是缺乏安全感。她通过“挖苦”母亲来掩饰对离家的愧疚，通过“搅拌咖啡”来掩饰对退股的不安。她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软弱，因为在她经历的那个特殊时代，软弱就意味着被吞噬。

倩媚的“选择”看似主动，实则处处被动，被匮乏驱赶，被恐惧支配，被时代的裂痕撕裂。当她决定留下孩子独自远嫁美国时，她并非毫无母性，而是“跟着大富只有痛苦”的恐惧压倒了亲情。最终，她成为一个永远在路上、永远无法安顿的飘零者。

4、对照的众群像：承载稳定的价值观。对照，是指将两个或多个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优劣或关联。其核心在于“互相对比、彼此参照”。

小说《选择》最精妙的人物设计，在于围绕倩媚设置了一组功能明确、性格鲜明的对照人物。这些人物各自承载着某种稳定的价值观，与倩媚的摇摆不定形成强烈反差。

民进与初杰——被辜负的理想主义者。民进是倩媚内地时期的恋人，即将赴广州上大学，代表着知识、理想和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倩媚离开他时，将理由归结为“你所追求的不切实际，我所追求的你又觉得太过市儷”。这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不可调和。初杰则是倩媚在香港遇到的敦厚青年，“一天到晚只懂说什么作育英才”，他的诚实忠厚曾让倩媚“面泛微红”。然而，当他患上肾病、每周洗肾直至死去时，倩媚的回应却是“死也是一种解脱”。

倩媚的母亲——沉默的承受者。母亲在开篇出场后便退居背景，但她的形象极具冲击力。她“挤出一个苦澀的笑容”，她欲言又止的“啊……”，她面对女儿的调侃只能沉默。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传统农村妇女的形象：隐忍、寡言，将苦楚咽进肚里。母亲从不谈论“选择的权利”，因为她的人生根本没有选项。她对女儿的担忧、不舍与无奈，全部凝结在那句“啊……”和苦澀的笑容中。

素英——扎根的实践者。素英是倩媚的同龄人、同事和好友，却与倩媚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她与爱人小文共同经营补习社，从一间扩展到五间，最终投身公益事业。当倩媚在电话中羡慕地说“你们真是有理想，有干劲”时，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朋友的祝福，更

是对自己生命空洞的隐约觉察。素英怀孕、成家、事业的圆满，与倩媚离婚、弃子、继续漂泊的结局，构成了整部小说最沉痛的对比。

5、悲剧性的轮回：从逃离匮乏到囚禁自我。轮回，源于古印度宗教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指生命或意识在死后，以另一种形态重新进入世界，经历不断生死循环的过程。它像车轮一样旋转不停，因而称为“轮回”

小说《选择》最精妙的人物设计，在于陈博士并没有让倩媚成为一个单纯的“拜金女”符号。在小说的后半段，我们看到了她性格中悲剧性的一面。当她成为新加坡丈夫的“金丝雀”和“生育机器”时，她发现自己从一种物质的匮乏，陷入了精神的囚禁。她那句“我是再不能捱穷的了”，既是她的动力，也是她的诅咒。为了逃避贫穷，她把自己卖给了“安稳”，结果却失去了自由和尊严。

在小说的结尾，那个曾经精明强干、掌控一切的倩媚，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孤独的老妇人形象。她在信中写道：“我被人抛弃了。”这是她一生都在极力避免的结果，最终却未能避免。也许这就是悲剧性轮回的结局吧。

本章结语：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理伤痕。陈博士在《选择》中塑造的人物，绝非简单的道德寓言角色。倩媚的挣扎、素英的笃定、民进与初杰的忠贞、母亲的沉默，共同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与内地交汇处的生存图景。而倩媚的个性特色，归根结底是创伤后遗症的体现。她不相信报应，只相信实力；不相信永恒，只相信当下；不相信温情，只相信金钱。倩媚的悲剧不在于她选择了物质，而在于她除了物质别无选择。

陈博士通过倩媚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和人为的灾难，她的灵魂往往会变得干瘪。她或许能通过“精明”的选择获得物质上的“优待”，但永远无法填补内心的“荒芜”。倩媚赢了所有的算计，却输掉了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与丰盈。这不仅是倩媚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一代人的、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痕。

第2章

语言修辞特色：选择的言说，语言风格与叙事策略

所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符号系统。而语言修辞，则是指人们在说话和写作中，为了追求最佳的表达效

果而积极调整、修饰语言的行为与技巧。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其极致的“冷叙事”风格。整篇小说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煽情、修饰与心理独白，采用一种近乎“临床记录”般的冷静笔调，通过克制的对话、重复的修辞、精准的物象与书信体的反差，构建了一套与主题高度同构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风格，既是人物生存状态的精准写照，也是作者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刻解剖。

文中以看似平淡朴素的笔触，在口语对话、书信体独白与线性叙事之间自如转换，构建出一套与“选择”主题高度契合的言说方式。语言的重复、节奏的错位、意象的隐喻性，共同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时代加诸其身的无形枷锁。

1、重复的修辞：言说塑造里的选择。重复，是指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再次出现，或将同一动作、内容再做一次。其核心在于“又一次发生”或“不止一次进行”。

几乎是贯穿全篇，陈博士将倩媚的语言进行重复出现，形成了一组固定的句式：“我已經詳細的、認真的、謹慎的考慮清楚。”这句话在分手、退股、再婚等关键节点重复出现。每一次，她都使用近乎相同的措辞，仿佛在向对方、更在向自己证明选择的“审慎性”和“正确性”。这种重复并非语言贫乏，而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暴露。每一次重复，都是对内心不安的一次机械性打压。与之相伴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選擇的權利”等抽象词汇的高频出现。

这种刻意重复并非作者的语言贫乏，而是一种精妙的修辞策略。倩媚越是强调自己“考虑清楚”，读者越能感受到其中的自我说服意味，选择的正当性需要通过语言的反复言说来确立。与之呼应的另一组重复是“追求幸福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这些抽象的、近乎口号化的表述，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每一次都出现在倩媚放弃一段关系、投向新生活的转折时刻。语言在这里成为自我合理化的工具，却也在重复中暴露了其脆弱：当“权利”成为唯一的论据，选择本身的道德重量反而被悬置了。

值得强调的是，与倩媚形成对比的是母亲和素英的语言方式。母亲从不使用抽象概念，她的语言是具体而节制的：“荔枝早就过了时”“还未到八月，哪里来柿子吃？”每一个回答都在现实限制中划出边界。而素英的语言则带有共情与试探的细腻：“你真的决定这样做？你还是考虑多一会儿吧！”这种对比，使倩媚的重复性话语在小说中

特别有特色，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

口号式语言虽然空洞，但揭示了倩媚“选择”的虚妄，不是在表达自由，而是在背诵这种为了生存而必须信奉的教条。语言的重复，成了她自我合理化的唯一武器。我想，这类重复语言的运用，便是陈博士的语言艺术所在。

2、对话的节奏：日常交谈中的潜流。对话，是指两个或更多人之间进行的语言交流活动，其核心特点是相互交替、回应与意义共建，区别于单方面的讲述或独白。

陈博士在小说《选择》中大量运用直接引语，对话占据了整篇小说的主要篇幅。从表面上看，这些对话流畅自然，贴近日常口语，但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陈博士对对话节奏的精心控制。如小说开篇母女有关水果“荔枝”和“柿子”的对话：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荔枝。”

“荔枝早就过了时。”

“我想吃柿子。”

“还未到八月，哪里来柿子吃？”

“那你又问我想吃什么？”

面对母亲关于离别的感性追问，倩媚的回答全部围绕物质展开：“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当母亲试图用“荔枝”和“柿子”唤起情感共鸣时，倩媚却用“过时”“未到八月”进行理性的解构，最后以“只有两种就问我吃什么”终结话题。这种对话的错位，语言上呈现出一种情感的真空——母亲在谈离别，女儿在谈供需。陈博士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最彻骨的隔膜。

母女对话中，以极短的问答推进，每一句都是对前一句的否定或反诘，节奏紧凑，几乎不容喘息。最终以倩媚的反问收尾，既透露出她的机敏，也暗示了母女之间沟通的不对等。母亲试图通过水果表达情感，女儿则将选择水果作为对选择本身的嘲讽。随后的长篇独白中，倩媚用一连串“省得你说我偏心，选了龙眼又说对不起你买枇杷给我吃的苦心，选了枇杷又说忘记了你买龙眼的辛苦”的排比句式，将母亲的潜在责备一一堵死，语言在这里成为控制关系的手段。

而一句“只有兩種就問我想吃什麼，那麼我可選擇的倒少得很呢！”则让读者会意一笑。它不仅提示了倩媚对选择的热衷和在意，而且还较好地呼应了小说的主题——“选择”。

在小说《选择》里，停顿与沉默的标记是又一个语言修辞特征。小说中多次出现“啊……”（母亲欲言又止）、“她顿了一顿”“过了一会”等提示词。这些停顿在小说中制造了情感的裂隙，让读者感受到那些无法被语言直接承载的情绪：不舍、愧疚和迟疑。尤其是母亲“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这个结尾，与女儿“哈哈地笑了起来”形成强烈的对比，语言的内容与表情的非语言信息之间产生剧烈反差，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往往溢出口语之外。

3、书信的引语：两种声音间的距离。书信体，是一种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文章体裁。它模仿真实书信的格式与口吻，但有时并不真的寄出，而是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或论述方式。

小说《选择》在第二部分插入了一封倩媚写给民进的信，之后又在小说结尾穿插了倩媚写给素英的信。书信体的引入并非偶然，它标志了人物内心独白与外部对话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发现，陈博士在安排小说人物的口语对话中，倩媚往往言辞敏捷、善于辩驳，甚至带有几分咄咄逼人。但在书信中，她的语气变得迟缓、迟疑，充满自省与分裂：“几时想跟你说，就是说不出口。今天，拿起笔来，真不知如何写好。”书信体允许她展露脆弱，也允许她表达矛盾的情感——“我曾经深爱着你，并且现在依旧喜欢你，只是我不得不如此选择”。这种“爱”与“不得不”的并置，在口语中从未出现过，只有文字才能承载如此复杂的心理层次。

有意思的是，第一封信是倩媚写给民进的“分手信”，第二封信是她被阔财抛弃后写给素英的“告知信”。前者的“分手信”是宣告自己的“选择”，后者的“告知信”则是追悔自己“选择”的后果。书信体在这里构成了小说的情感核心：那些无法在当面说出口的话，那些需要在独处中梳理的思绪，最终都通过文字得以呈现。陈博士巧妙地将书信嵌入小说的叙事之中，让人物的公共形象即对话中的强者，与私人内心即书信中的弱者之间，形成对照，从而塑造出一个立体的、充满内在分裂的形象。

与上述语言相对，小说《选择》中倩媚与素英的对话，则以“喂”“喂”的电话开场，节奏明快，信息密集，充满了都市生活的效率感。陈博士通过不同媒介即面对面、电话、信件的切换，让人物的语言风格随之变化，从而揭示了媒介本身如何塑造人的表达方式。

4、隐喻的植入：水果与动物的象征。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和认知方式，指不直接说出某事物是什么，而是借用另一种有相似点的事

物来暗示或指代它，就是“将甲事物说成乙事物”，以此增强表达的形象性或揭示深层意义。

小说《选择》里的语言修辞还在于，将“选择”这一抽象主题转化为具体的物象。开篇的“龙眼”与“枇杷”是最早的隐喻：母亲只给了两种水果供女儿选择，女儿则通过“两种一起选”消解了选择的意义。这一场景为整篇小说设定了寓言性的基调，可供选择的选项从来有限，而选择本身也未必带来满足。

耐人寻味的是动物隐喻的渐进使用。在小说《选择》结尾处，倩媚对素英说：“假如蚂蚁知道自己只是一只蚂蚁，生来就是不停背起比自己还要重不知多少倍的东西，一直到死才停止的话，我想，它们也会选择死亡的。”这里的蚂蚁比喻，与之前她自称“金丝雀”（被大富养在笼中）、以及素英的“蝼蚁尚且偷生”形成了互文。三种动物“金丝雀”“蚂蚁”“蝼蚁”，分别指向不同的生存姿态：被豢养的宠物、劳役至死的工蚁、卑微求生的虫豸。倩媚的悲剧告诉我们，她一生逃离“金丝雀”的命运，却最终认同了“蚂蚁”的存在本质：活着就是背负超重的负荷直到死亡。

这些隐喻之所以具有力量，恰恰因为它们来自人物的语言，而非作者的旁白。当倩媚说出“金丝雀”时，读者理解她的不满；当她说出“蚂蚁”时，读者感受到她的绝望。这种语言修辞手法，使物象语言承载了抽象思考，小说的主题由此也获得了可触可感的质地。

5、句法的张力：长短句的巧妙运用。句法，是指组词成句的规则系统，即如何将单词、短语按照一定规律组合成合法、通顺的句子，并解释句子内部的结构关系。

我们研究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的句法特征可以发现，倩媚在不同情境中会使用不同长度的句式，当做出重大决定时，往往使用短促、果断的句子：“我离了婚，一身轻松。”“我到美国结婚。”“下个月。”这些短句营造出一种不容商议的决绝感。而在她表达内心矛盾时，句子则会骤然变长，充满修饰与插入语：“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有没有选择错误，我只是在保护自己。我不知自己有没有选择错，也许，我根本没有选择错，只是环境将我塑造成会作出这样选择的人，于是我这样选择。”

出现在最后一封信中的长句，几乎不带标点停顿地倾泻而出，语法结构松散，主谓之间插入多个分句，呈现出思维的游移与自我反驳。这种句法上的“犹豫”与内容上的“选择”主题，形成了强烈反差，

就是她越是宣称自己“有选择的权力”，语言就越暴露出选择背后的被动性。最终，“我们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们选择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嵌套句式，以语言的复杂结构对应了思想的悖论，成为整篇小说最深刻的哲学注脚。

本章结语：语言可以作为存在的居所。陈博士在《选择》中展示了语言如何既是人物的面具，又是人物的伤口。在小说里，他安排了倩媚用重复的句式、果断的短句、抽象的“权利”话语来构筑一个主动选择者的自我形象，但书信中的迟疑、隐喻中的绝望、句法中的游移，却泄露了真相：她从未真正拥有选择的能力，只有对选择的不断重述。小说的语言修辞特色正在于这种自我分裂，说话者与真实情感之间的裂隙，恰好是人物悲剧性的精确写照。

小说《选择》的语言风格，始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口语中夹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表述，如“新年代”“人望高处”等，书信格式则保留了传统尺牍的问候语。然而，它对重复、节奏、隐喻和句法的精细控制，使它超越了特定时代的边界，成为探讨“选择”这一永恒主题的精致文本。当倩媚最终说出“忘记我也好，紧记我也好，反正，这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时，她终于承认了语言也无法抵达的自由。这或许是小说《选择》最诚实的声音。

第3章

时代隐喻特色：时代的夹缝，地缘变迁中的生存博弈

所谓时代隐喻，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被广泛用来象征、暗示或解释该时代核心特征、精神气质或深层矛盾的隐喻。它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认知方式。就是人们借助一个熟悉的领域（喻体），来把握所处时代的复杂现实。

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欢录，更是特定时代变迁的微缩胶卷。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便是一部极具时代厚度与历史痛感的佳作。小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为宏大背景，借由女主人公倩媚在大陆、香港、新加坡及美国之间的辗转漂泊，精准地刻画了那一代人在地缘政治剧变与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的精神阵痛与生存博弈。

小说《选择》的时代特色，不仅在于其记录了物质生活的变迁，更在于深刻揭示了地缘政治裂变、资本逻辑入侵与历史创伤延续如何

共同挤压个体的生存空间，使“选择”成为一种虚妄的奢侈。

1、意识形态的撕裂：从“不切实际”到“太过市侩”。意识形态，是指一套系统化的观念、信仰、价值和理论体系，它解释社会如何运作、提出理想的社会图景，并指导人们如何采取行动。既是理解世界的“眼镜”，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动纲领”。

小说《选择》敏锐捕捉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碰撞下所产生的巨大撕裂感。倩媚从当时物资匮乏的大陆走向繁华的香港，她的每一次抉择都深深烙着时代的印记。在写给初恋民进的绝情信中，她坦言自己“渐渐认同这边的生活，认同这边的思想”，并直言对方追求的“不切实际”，而自己追求的却被对方视为“太过市侩”。

这种情感上的分道扬镳，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价值观的决裂：一边是尚未褪去理想主义色彩、带有浓厚集体主义烙印的大陆青年；另一边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逻辑迅速规训、将物质安全感置于首位的新移民。倩媚那句“良禽择木而棲”，看似是极其清醒的个人主义宣言，实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边缘个体为了抵御身份焦虑和阶层跌落而做出的本能防御。

可以说，倩媚与民进的分手信，是时代裂痕最尖锐的体现。当倩媚坦言“我所追求的，你又覺得太過市儈”时，这不仅是个人价值观的冲突，更是两种经济体系、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可调和。大陆仍在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余温中徘徊，而香港已被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全面接管。

倩媚的“市侩”并非天性凉薄，而是她在新环境中为了生存下去的必然进化。陈博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时代这种地缘流动带来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倩媚成了既不被大陆接纳、也不完全属于香港的“无根一代”。

2、资本的物化：“金丝雀”与“生育机器”的宿命。物化，是指将人（或其属性、关系）当作物品或商品来对待，忽视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情感和尊严。其核心是把“活生生的人”降格为“可被操控、计算、买卖的对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伴随着阶层固化。小说《选择》就是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在资本逻辑下，社会底层女性如何通过婚姻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进而达到自己追求生活安逸和幸福的目的。

倩媚从初杰到大富的选择，是当时香港社会现实的冷峻写照。初

杰代表的“作育英才”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显得苍白无力；大富代表的“几层楼收租”则是实实在在的资产保障。小说毫不避讳地展示了婚姻市场的交易本质：倩媚以青春和身体为筹码，换取免于贫穷的“安全感”。这种时代特色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爱情小说的浪漫滤镜，还原了在住房、生计压力巨大的年代，婚姻往往是一场关于生存资源的谈判筹码。

小说《选择》深刻揭示了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的社会转型期，女性物化与自我异化的悲剧宿命。倩媚的一生都在试图通过婚姻或依附男性来跨越阶层、获取庇护。从拒绝贫穷的民进，到抛弃理想的初杰，再到远嫁新加坡的大富，直至最终奔赴美国的阔财，她的每一次“选择”，始终围绕着房产、租金与安稳展开。然而，这种以牺牲爱情与尊严为代价的交换，换来的却是极度的物化。在新加坡的婚姻中，她悲哀地发现自己沦为“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和一台“生育机器”。

在那个崇尚金钱至上、男权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缝隙里，倩媚自以为抓住了命运的主动权，实则只是将自己作为筹码，摆上了时代的赌桌。她放弃了补习社那份虽清贫却充满生机与互助的女性情谊，也就此丧失了建立真正独立人格的可能。

3、历史的幽灵：“时代”创伤与“幸存者”逻辑。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真实发生过的全部事件与过程；二是指人们对这些过去事件的记录、研究和解释。历史，既是“发生过的事”，也是“后人讲的故事”。

小说《选择》触及了特殊历史时期给一代人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倩媚那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底色，皆源于早年目睹父亲被逼自杀的惨痛记忆。她在信中对素英剖白：“經歷過我那個年代的人，誰不多多少少懂得點生存之道？誰不竭力保護自己？”这句泣血之言，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隐疾。

当信仰崩塌、道德失序，传统的温情便会被残酷的斗争取代，幸存者们只能将“自我保护”奉为最高准则。倩媚对苦难的麻木、对他人痛苦的冷眼旁观，如对初杰之死的态度，并非天生薄凉，而是极端环境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她将人生比作背负重物的蚂蚁，认为生不如死，这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正是那个时代留在她灵魂深处的疤痕。

在那样一个道德失序、人性扭曲的年代，温情与信任是致命的弱点。因此，生活在一九九二年的倩媚，依然在用过去的一九六六年的生存法则在生活。陈博士深刻地指出：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潜

伏在个体的基因里，继续支配着当下的选择。

4、回归的焦虑：“离散”情结与“身份”重构。回归，是指回到原先的状态、位置、主题或归属。其核心是“返回原处”或“重属原有体系”，包含一个离开后又折返的过程。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写作时间是在一九九二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弥漫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表现为一种极致的“离散情结”。倩媚最终选择离开香港，远嫁新加坡，最后又计划奔赴美国。她的脚步从未停歇，因为她担心香港不一定是她的避风港。

倩媚不断向外寻找“更好生活”的行为，折射出当时一部分港人面对未知未来时的焦虑与不安，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扎根，那就去下一个地方。然而，陈博士通过结局的残酷反转，如在新加坡被当作金丝雀豢养、最终被抛弃，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逃离并不能解决身份焦虑，地理上的位移无法治愈心理上的“无根”。

这种焦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身份上的。倩媚在信中说“连跟别人沟通也感吃力”，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她在大陆是“乡下人”，在香港是“大陆妹”，在新加坡是“金丝雀”，在美国将是“阔太太”。她永远在新的环境中重建身份，又永远被排除在核心身份之外，最终的结局则不言而喻。

5、地缘的悖论：从“人望高处”到“无处安放”。地缘，其核心是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和关系的制约与塑造，强调地理位置、距离、资源分布、地形等自然条件如何影响群体与国家的行为。

小说《选择》深刻揭示了在全球化初期，地缘流动带来的生存悖论。倩媚一生都在践行和信奉“人望高处，水望低流”的信条，从农村到城市，从贫穷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每一次流动的选择都伴随着对过去的背叛和对未来的豪赌。

然而，陈博士通过倩媚的结局揭示了地缘流动的残酷真相：物理空间的上升（从乡村到国际大都市）并不等同于精神空间的安顿。倩媚的悲剧在于，她将“流动”本身误认为是“进步”，将“逃离”误认为是“选择”。当她最终被阔财抛弃，身处一个“无亲、无朋，连跟别人沟通也感吃力”的地方时，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牢笼”逃到了另一个更大的“牢笼”。

这种地缘流动的悖论，是冷战后期至全球化初期无数移民的共同命运。他们以为通过地理位移可以获得自由，却往往在异国他乡发现，

自己却成了永远的“他者”，永远的“客人”。

本章结语：选择的虚妄与命运的嘲弄。纵观《选择》全篇，陈博士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解构了“选择”这一现代命题。在宏大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所谓“选择”往往是虚妄的。正如倩媚在绝笔中所悟出的那般：“我们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们选择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倩媚一生都在精明地趋利避害，最终却被时代无情抛弃，落得个无亲无友、沟通吃力的凄凉晚景。这种对“无根性”和“不确定性”的焦虑，也是当时香港社会的集体潜意识。

结 论

这是精明与荒芜的二重奏。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具有时代特色，是因为作品说明了一个观点，即在宏大的历史结构面前，个体的所谓“自由选择”往往是虚假的。我以为，《选择》在今天看来，它仍具穿透力和警示性，提醒我们在一个将“选择”神化为绝对自由的年代，“选择”有可能变成为可怕的不自由。当我们永远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时，有可能正在失去选择“好的生活”的能力。

陈博士没有简单地将倩媚塑造为一个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是让读者感受到她的真诚与脆弱。我想这就是《选择》独特价值所在。“我不是一个负心的人，我只是不得不如此选择”——这句话，贯穿了倩媚对民进、对初杰、对孩子的每一次告别。由此让我们看到，在剧烈变迁的社会语境中，“个人选择”常常是一种被内化的生存本能。因而我们既不美化选择的自由，也不能否定“选择”的必要。我们应该看到，在个人意志与社会结构、主动追求与被动接受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悲剧因素。这种悲剧因素，可能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存在境遇。

应该说，《选择》是一部个人的流浪史，更是一代人的警示史。倩媚的“选择”看似精明，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她用尽半生逃离苦难，最终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苦难的本身。在时代的背景下，自以为清醒的趋利避害者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嘲弄。这不仅是倩媚的悲哀，更是所有在动荡中试图以牺牲灵魂为代价换取自身安稳者的警示。

哲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我以为，陈

博士就是一位善于撬动地球的文学界能人、闻名遐尔的香港著名作家，亦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跨界作家。我点赞陈博士！更期待他以短篇小说《选择》为原点，在文学创作中有新的建树，创造新的特色！

2026年6月15日写于宝应可人书屋